

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生态类型初探

李 鹤 鸣

从社会生态学角度出发,长江三峡库区移民可分整体近迁、分散近迁、整体远迁和分散远迁四种类型。在进行移民规划及实施操作过程中,要概括各类型不同特点制定政策和措施。

作者:李鹤鸣,男,1956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

一、移民社会生态研究的重要性

建国以来我国修建各类水库 8.6 万余座,水库库区移民共达千万之众。^① 此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引起的深刻教训。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移民过程缺乏社会生态学的深入细致研究。具体表现在移民规划及实施操作过程中就是,片面强调水利工程建设的功用和效益而严重忽视与之相伴随的潜在负效应及移民本身的代价和损失;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或思想动员代替启动库区经济、扶植社区重建、引导移民自我发展的艰巨责任;仅从表面上进行一次性补偿、多次性救济、不断的“安置”,而未从移民利益立场出发推动移民从安身到立业再到安心的深层递进,因而造成不少社会隐患。难怪新安江水库建成数十年后,仍有 2 万多移民因生计所迫而倒流折返库区,^②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倒流现象并非个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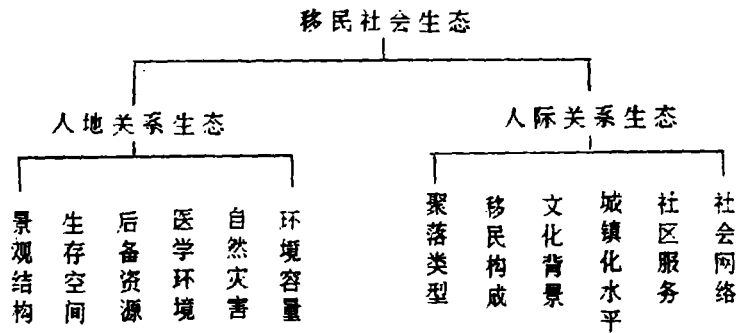
三峡工程规模巨大,库区移民总数超过百万,无论移民规模还是操作难度均史无前例。如此庞大社会群体之移动和定位,其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故必须接受以往教训,充分重视移民的社会生态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把移民规划及实施方案中对社会生态方面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作为水利工程建设成败与否的主要指标之一。

笔者认为,三峡库区移民的社会生态研究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地关系生态,主要指移民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即三峡工程建成后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对移民的容纳量大小和相宜性程度,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人际关系生态,指移民在社会文化背景发生改变的情境下,不同社会群体的重新融合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与重建,属于社会关系层面。

试以下图概括移民社会生态的主要研究方面。

① 田方、张东亮:《中国人口迁移新探》,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中国科学院编:《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二、移民社会生态的类型与特点

移民本身是相当复杂的,在社会背景、价值观念、文化素质、经济条件、生活需求诸方面都是千差万别的,从移民个体看则更是如此。本文的移民类型划分较为粗略,主要强调移民社会生态群体。即根据上述研究思路,一是按移民搬迁距离(即相对于原居住地距离)分为近迁和远迁:近迁指上山后靠,原则上不脱离库区;远迁则指迁移出库区范围。二是按搬迁方式分为集中整体搬迁和局部分散搬迁。综合两方面因素,大致可分为四种迁移形态。

整体近迁型

指大坝建成后村子完全被淹,村民被全部迁出并就近安置(因完全被淹的县、乡不多,故“整体”是指自然村)。刘家峡、三门峡等库区移民经验表明,整体近迁是易被移民接受的迁移方式。^①三峡库区也是如此。葛洲坝工程移民时,坝首区部分移民远迁至100公里外枝城市董市镇,这一带人仍对远迁枝城心怀恐惧。有的移民户对迁往三峡坝址下游仅10公里处也不愿意。^②如果不得不迁移的话,他们宁愿选择整体近迁。这是因为整体近迁使移民可基本保持原有社区,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可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新的环境之中,较少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冲突与摩擦,社会交往便利,人际关系较融洽,较易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近迁使移民可较快地适应并熟悉新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因自然景观、山水田地、土壤性状、生产习惯都与原居住地相差不大,故对发展生产和重建家园有利。但三峡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开发较早,自然条件较优的地方已被垦殖或利用,因而导致生产与生活资源相对稀缺。近迁的移民多是上山或后靠,现成的耕地、宅基地、水源、菜地等后备资源可能不足。随山地垂直高度增加,地形更复杂、坡度更陡,滑坡、泥石流、山洪、干旱等灾害威胁相应增大,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及可利用资源质量变差(特别是土壤变薄变瘠),加上山地景观生态的约束,将使库区移民环境容量受到很大限制。

分散近迁型

指移民迁出被淹库区后,难以保持原有聚居村落完整性而就近分散“插入”或“嵌入”现成社区。少量移民作为“外来户”进入既有社区可能受到社区排他性影响,这种排他性产生于原有社区的“社会场”。从人地关系看,社区原住居民已将各项资源分配完毕(尤其耕地、水面、生产资料 and 山场均承包到户),由于库区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原住居民很少愿意“忍痛割爱”,更不愿将好地、成片林地让给外来移民。如果资源分配格局受到破坏,可能引起原住居民的抵触和

^① 杨凤洲:《试论水库工程农村移民安置问题》,《人民黄河》1992年第9期。

^② 赵宜胜:《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对社会学的呼唤》,《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不满,并将这一切后果直接归咎于库区移民的迁入。据笔者对即将接纳库区移民的湖北省鄂西山区某县的调查,该地农民对三峡工程建设是理解并支持的,但对移民到来心存忧虑,特别担心已承包土地被划分出去:“我们这儿山大平地少,良田更少,又不知道来多少移民。他们来了我们要欢迎,但矛盾也是不可免的。”这是一位村干部的话,至少代表了部分原住居民的想法。

从人际关系看,原住居民祖辈生息繁衍于斯,彼此熟悉融洽,形成各种生活与交往圈或传统上相对固定的“社会场”:对“场”内人具有吸引或亲和倾向,对“场”外人则具有本能的排斥倾向。某些投亲靠友的移民户可凭借亲友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场内人”,而一般移民户则较难进入原住居民的生活圈。若发生利益纠纷或社会冲突时,人地生疏的移民外来户显然处于以寡对众的不利地位,故很容易引发移民怀念故土乡亲的情绪,甚至影响到移民社会群体的稳定性。难怪居住在巫峡大宁河岸的移民表示了明确而强烈的整体迁移愿望,他们说:“我们这里人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要我们分开真不习惯,不搬家更好,要搬大家一起搬!”相对农村移民而言,城镇社区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些,因为除了就业及人事关系的问题外,没有直接的资源分配冲突。城镇社会交往一方面邻里之间不如乡村那么频繁紧密,甚至比较隔膜,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隔膜;另一方面城镇社交范围较大,文化生活丰富多样,且不存在风俗礼仪的太大差距及语言障碍,使“社会场”的相斥性弱化,社区排他性也可能显著淡化。

整体远迁型

有人提出三峡库区移民远迁设想,迁入地一为武汉城郊,二为俄罗斯、东欧和南亚,三为东南沿海地区,并称远迁只要地点选择好,其综合效益优于近迁与后靠。^①

不可否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确实具有观念基础;不仅每年都有大批农民涌向内地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就是西北内陆贫困地区也有环境移民的成功例子。但库区移民与贫困地区环境移民不同:后者因所在环境的自然条件特别恶劣而无法生存,为生计所迫而动迁,且迁后环境条件比原地强,物质生活的改善比较明显,多数移民在两相比较之下自发迁移,故容易适应新环境。库区移民所在地生存环境不差,且故土亲、乡亲熟,他们本来并不愿离开,只是不得已而迁移,事实上他们为国家利益和全局利益作出了各种牺牲及很大贡献,易产生依赖心理或所谓“移民情结”,若新环境不如人意,怀旧之情油然而生,移民失落感越发加重。报载四川万县和海南省合作建设“移民村”,在大特区海南开辟移民试点基地。这一试验性质的举措很有意义,因为海南省人口较少,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劳力短缺,加上宽松的政策和具有活力的经济,为此试验成功提供了内在和外在于条件,若前期移民能在海南安居乐业,对库区群众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很可能引发远迁的倾向和愿望。即便如此,对远迁移民数量要严格控制。显然,对国内远迁应周密考虑,详加论证,特别要注重对以下因素的分析:(1)移民和迁入地之人地关系(资源可利用量、医学环境质量、移民环境容量等);(2)移民与迁入地原住居民的文化背景差异(风俗习惯、教育水平、语言交流等);(3)移民本身的意愿;(4)移民补偿强度。

三峡库区移民向国外远迁必须慎之又慎。一方面,生活于内地峡区的移民与国外居民的文化背景差异更为悬殊,国外“社会场”的相斥性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土地宽裕,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政策相当严格,绝不会接纳大批库区移民。而为向移民负责,自然条件太差、社会环境不稳定的区域又难作迁入之地。从所提出的移民接受国家和

^① 伍新木:《三峡工程库区移民社会发展设计》,《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2年第3期。

地区来看,俄罗斯政局动荡、消费品供应紧张,几乎完全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勉强维持现时的俄式改革和民主。东部西伯利亚虽然国土广阔、资源丰富、劳力缺乏,但气候严寒冷酷,久居南方的三峡移民恐难适应。东欧人多地狭,正处于改革转轨的阵痛时期,经济很不景气;德国等西欧国家排外浪潮不断升级,连零散的外籍劳工也不能幸免,何况成批的库区移民;南亚地区种族宗教冲突不断,财政经济毫无生机,实为世界上最贫困地区之一,我们忍心把失去生存土地、作出诸种牺牲的库区移民迁往这种前途难测的地区?况且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孟加拉等国早就有人满为患之虞。笔者认为,向国外远迁困难重重。

分散远迁型

仅从社会文化的层面看,分散远迁可能比整体远迁更有难度。因为整体远迁可选择环境条件较优的区位进行开发,重建新社区,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类似于国外的“唐人街”。但分散远迁则是一户、数户移民进入陌生文化社区,很容易处于举目无亲、孤立无援的境地。移民虽可背井离乡或远徙他方,但故土文化的烙印终生难移。在新环境中可能处处不习惯、事事都别扭,容易产生文化隔阂和精神压抑。特别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反差、社会交往中习俗差异和语言障碍,移民可能受到迁入地“社会场”的明显排斥。若迁移到沿海发达地区,移民的商品意识、生活方式都与当地人有较大距离,在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中恐一时难以适应。分散移民为适应新文化和经济环境并闯入当地“社会场”,必须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精神压力。移民也可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但也许要比当地人付出成倍甚至数倍的努力和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分散远迁者主要是年纪较轻、文化素质较高者,则他们有可能摆脱原有文化传统的束缚以及旧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较快地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被迁入地的“社会场”所吸收,并可以开拓出崭新的事业与发展空间。也许这是分散远迁相对于整体远迁的有利之处。

三、结论与建议

1. 近迁应成为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方式,国内远迁作为辅助方式要优选迁入地点,要详细规划、全方位论证;对跨国远迁则应持谨慎态度。

2. 整体近迁虽有社会稳定的好处,但缺乏文化交流与社区创新的动力,故要使近迁和观念变革、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同步进行并协调统一,重建社会主义新型乡村和城镇社区。

3. 分散近迁要做好迁入地人口承载能力和移民环境容量分析,兼顾移民和原住居民的利益,并可考虑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原住居民适当补偿(从移民费中开支),以缓解资源分配矛盾,使移民和原住居民尽快融洽,彼此和谐相处。

4. 设计并创造多样化的移民搬迁模式,兼顾国家、集体、移民利益,规划先行,政策到位、资金到位,变被动的安置性移民为积极的开发性移民。

责任编辑:唐 军